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怎么来的

□ 祝 彦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表述被诸多党史著作和研究成果所采用，已然约定俗成为关于党的创建史和陈独秀、李大钊对党的创立所作出特殊贡献的一句经典性评述。这个似乎耳熟能详的表述，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先有“北李南陈”，再有“南陈北李”

在历史上，最早的表述是“北李南陈”。目前所见文献史料，最早使用“北李南陈”的是五四运动期间在北京大学受教于李大钊的赵世炎。他于1920年8月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在一张李大钊与陈独秀合影照片后面的硬板上，写了一篇杂感，其中提到在勤工俭学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当时还有一首嵌名诗：“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也在五四运动和中共创立时期社会上广泛传颂。这两首诗的作者是谁，目前尚不清楚，都没有史料佐证，但从语气看，最大的可能是出自当时追随陈独秀、李大钊，并活跃在北大校园里的一批学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之手。

上述两处使用的都是“北李南陈”。直到1933年4月23日，在社会知名人士和家属为李大钊举行的葬礼上，送葬队伍中有一副由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的杨杏佛送的挽联写道：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才有了“南陈”“北李”的表述顺序。

把“南陈北李”组合起来使用，目前所见文献是，1943年3月，出席一大的一位代表在《古今》半月刊上发表《扶桑笈影溯当年》，文章中中说，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主张组织共产党，经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陈独秀）负责，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钊）负责，即所谓“南陈北李”。1947年4月26日和5月3日蔡尚思在《文汇报》上发表《李大钊的思想评介》，文中说李大钊是中共初期的理论家与实践家，他与陈独秀齐名，被世人称为“南陈北李”。1987年12月，梁漱溟在其书中回忆李大钊时说：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为首的是陈独秀、李大钊两先生，一时有“南陈北李”之称。

“相约建党”是对一段历史背景的概括

“相约建党”，这四个字其实是基于历史过程的一个概括性描述，即1920年初李大钊冒险送陈独秀去天津，在路上谈到建党之事。

对于这一历史过程与背景的最早叙述，是当时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报道《武昌中山大学集会追悼李大钊等烈士》，文中写到5月22日在武昌中山大学举行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与李大钊关系密切的高一涵作为《李大钊同志遗嘱》的演讲，演讲中有一段描述性内容：“（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指李大钊——引者注）同至武汉演讲，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因此大触政府之忌。”并说到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开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共产党事”。这就是“相约建党”的历史背景依据。

1963年10月，高一涵又作过一次内容相似的回忆，并对“化装同行”的过程细节讲得更加具体生动。他说：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同志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门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换王星拱

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到了天津，即购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为什么高一涵能够叙述得如此详细呢？这是因为高一涵与陈、李存在不同寻常的关系。高一涵原名永浩，笔名一涵，安徽六安人，于1912年自费留学日本入明治大学政法系就读。1916年7月回国与李大钊同办《晨报》，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他们都到日本留学、同在北大任教、一起参加五四运动等共同的政治爱好和相似的生活经历，把他们3个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以这种历史渊源形成的深厚私交，高一涵回忆陈、李有相约建党之事，应该是可靠的。1926年，高一涵加入中国共产党。2011年出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采用了高一涵的叙述，写道：“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可以说明，高一涵叙述的这段历史得到党史权威部门的采信。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的形成

那么是什么时候，又是谁把高一涵的历史回忆概括为“相约建党”，并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组合起来使用的呢？

2001年北京大学萧然教授在《百年潮》上发表《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文章论证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不管是自己编写或者从其他人编写的各种教材和教科书中，以及各种党史研究的专著中，都没有提及、看到或者听到有关“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表述。通过论证，文中提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八个字的组合提法，始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梳理发现，1983年3月由著名历史学家、党史学界前辈李新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开端》一书中，采用了高一涵的回忆。该书写道：“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到天津。1920年2月，他们扮作商人，坐一辆骡车，先到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的家乡——大黑坨村。在大黑坨村住了几天，然后起程去天津。一路上他们交换了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他们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活动，筹建共产党。”稍加留意，以上这段文字后面一句话里，其实就有“相约建党”的关键字节——他们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活动，筹建共产党。如此看来，把这段历史背景概括为“相约建党”，应该是始于1983年出版的《伟大的开端》一书这段叙述。

“也许受这段叙述的启发，在此后的报刊上出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概括。”1986年5月，虞崇胜在《江汉论坛》第5期上发表文章，文章题目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时间和地点》。1989年9月由阎稚新、李善雨、肖裕声编著，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与中国革命》一书，在第二章中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标题出现；1991年10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中，也采用了高一涵的演讲内容，然后结论性地写道：“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可以视为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权威使用。

晚上又去另外一个地方调研，很晚才能回到驻地。淳安下姜村是浙江当时有名的贫困村，也是习书记的基层联系点，当时道路不通，交通很不方便，每次去都要坐船，经过很长时间的颠簸，才能到达那里。在下姜村，他走访农户，与村干部座谈，鼓励农民养蚕搞沼气。他亲自到蚕房看蚕茧情况，到沼气池看沼气发生情况，手把手指导下姜村民寻找发展之路。印象很深的一次是，从大陈岛回来，途中经过一江山岛。解放一江山岛是解放战争中打得很惨烈的一场战斗，也是人民解放军首次动用海陆空三军进行立体化作战才得以攻克的一个岛。习书记说，这样的革命纪念地，我们要去看看。但当时岛上没有停靠码头，地势险恶，尽管如此，习书记还是登上岛屿开展调研。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时浙江有90个县市区，习书记到浙江任职的头9个月时间里，就到66个县市区基层开展了调研工作，获取了第一手资料，并与地方和基层的干部交谈，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给他们以极大的鼓励与激励。他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把所有的县市区跑遍了，真的很不容易。

习书记的调研工作特别细致深入。调研前，他会详细地询问当地情况，一些基础数据都要掌握到个位数。我当时分管基层组织工作，跟习书记外出调研前，都要把最新的党员数、支部数等再记一遍，以备习书记随时了解情况。在调研中，习书记从来不是走马观花地随便看看，而是要亲上手操作。有一次，他



80多年前，刘伯承带领八路军痛击进犯山西的日本侵略者，取得歼敌400多人的辉煌战绩，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载入了史册。如今，在山西省平定县东回镇七亘村口，巍然耸立着一座纪念碑，四面体柱式汉白玉造型，由碑座、碑体和碑顶三部分组成。正面碑文刻着徐向前亲笔题写的“七巨大捷纪念碑”七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碑体两侧上部是步枪、红旗和五星组成的图案。纪念碑主碑周围同立10余通副碑，全方位、多角度图文并茂地介绍了那场震慑敌胆、“重叠待伏”的经典战例——七亘大捷。纪念碑背面碑文如下：

七亘大捷纪事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我军民奋起抗战。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刘伯承师长率领下，东渡黄河，以太行山区为中心，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是年十月中旬，刘师长率部开至正太路南，宿营于平定马山村。十月二十五日，获悉日军二十师团将取道九龙关迂回向平定开进，其辎重部队千余人由测鱼西上。七亘村系由测入平必经之地，刘师长借其地利，将七七二团三营设伏于此。翌日九时许，日军辎重部队在步兵掩护下进入伏击区，指挥员一声令下，伏兵居高临下出击。顿时，枪弹呼啸，杀声震谷，敌军惊恐万状，进退维谷，当场被击毙三百余人，并有大批军需物资和三百多匹战马被我方缴获。日军败退后，按兵家常规测度，以为我军得胜已撤，经严密组织兵力，于二十八日又沿原路向平定进犯。刘师长出敌意外，反常用兵，再次于七亘巧摆奇阵，致使敌人重陷伏击，歼尸百余人，骡马数十匹，溃败逃窜。连续两次伏击，我军伤亡三十余名，歼敌四百多人。七亘大捷是刘帅首次运用重叠的待伏战术的光辉战例。从此揭开了太行山区抗日游击战的序幕，为建立平东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值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在七亘树碑铭记大捷之经过，以缅怀殉国英烈，赞颂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激励后人学习先辈的爱国献身精神，为振兴中华建功立业。
一九八五年十月

碑文500余字，记述了七亘大捷的战斗过程及重大意义，铭记历史，缅怀不畏强敌、以身殉国的英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读后令人肃然起敬。

临危受命 挥戈东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继北平、天津相继失陷后，日寇以20万兵力大举进犯我华北地区。同年10月，

日军占领石家庄，沿正太铁路西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掠夺山西的煤炭资源，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国民党守军与日军对垒娘子关、固关一线，国民党军队作战失利，仓皇溃退，娘子关告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临危受命，率部东渡黄河，驰援娘子关国民党友军，以太行山区为中心，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0月中旬，刘伯承率部开至正太路南，于平定马山村宿营。经侦察，获悉日军第二十师团正在向山西平定迂回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判断分析，日军为了控制正太路南的平行大道，必然加紧从井陉至平定的小路运兵运粮，遂计划在此设伏，以射制日军迂回进攻，掩护娘子关友军。

缜密侦察 巧妙设伏

选定地形是伏击战的重要决胜因素。刘伯承亲自实地察看地形，发现七亘村四面环山，一关两口，三道关锁，沟壑纵横，峡谷陡峭，道路奇险，地势非常险要。日军要从河北进攻山西平定，就绕不开七亘村这个咽喉要道。10月25日，即令部队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势设埋伏。我军获悉日军第二十师团已向平定方向急进，其辎重部队1000余人在距七亘村10公里外的测鱼镇宿营。我一二九师七七二团三营充分利用有利地形，把主要兵力埋伏在山道南侧四五千米处的土坡上。10月26日上午9时许，我军放过日军先头部队100余名警戒，待敌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区，而后方掩护部队尚未跟进时，指挥员一声令下，发起突然袭击。我军居高临下，向敌人猛烈开火，日军遇袭后猝不及防，摸不清方向，兵力无法展开，火力不能施展，人马互相蹂躏，进退维谷。我军势如破竹冲进敌群展开肉搏战，采用拦头、截腰、堵尾战法，把敌人截成三段，迎头痛击。战斗中七七二团十二连四班战士、共产党员杨绍清冲在最前面，与迎面围上来的7名日军拼刺刀，在身负3处重伤的情况下，刺死日军6人，刺伤1人，夺获步枪3支。十一连连长李春山的刺刀在打拼中折断，在用枪托和敌人搏斗中，不幸身中多处刀伤，霎时鲜血直流，他一声怒吼，猛地把枪向敌人身上摔去，趁敌人一愣神，拼尽全力扑上去将敌人撞倒，击毙了日军，壮烈牺牲。至11时许，日军除一部分仓皇溃逃外，其余300余人均被我军歼灭，缴获300余匹战马及大量军用物资，我军仅伤亡10余人，取得了第一次七亘村战斗胜利。

反常用兵 精妙取胜

第一次七亘村伏击战胜利后，我军本应迅速撤离，另寻战机。刘伯承进一步分析敌情，认为日军第二十师团正向平定进犯，急需军用物资，敌人在七亘村受到打击后，与前方的交通联系被我军切断，大批军需物资急需向前方运输。在打通正太路之前，仍然只能走七亘村为先头部队送补给。刘伯承对兵家常理反其道而行之，果断命令七七二团三营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守株待兔”迎击敌人。28日，日军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书记看到毛氏宗祠已经成为危房，非常心痛，特批从省里拨经费，要求当地将毛氏宗祠修缮一新。现在的清漾村已经成为浙江省级文化村落，是当地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不仅如此，习书记对许多革命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都很重视，比如修建了嘉兴红船革命纪念馆，修缮保护平阳县凤卧乡浙江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革命遗址等，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习书记还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人，尤其是与群众在一起的时候，毫无大领导的架子，既真诚又朴实。他在浙江干部和百姓心目中的威信极高，大家都是真心地服他、敬他、拥戴他。记得有一次他去村里面调研，村支书对他讲：“习书记，我年纪大了，工作慢慢地要交给年轻人做了。”习书记就问他多大，村支书说53岁。习书记听了，当即决定要到这个地方去看看。可是通往那个村还没有大路，车子不好开进去。习书记说，走路也要去看看。后来我们就在他的带领下，从附近的公路上下车，徒步走到清漾村进行调研。习

书记说自己在浙江当省委书记，对浙江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历史传承、当下省情都要全面地掌握。所以他在浙江工作时总是特别细腻，了解情况也总是特别深入。有一次，习书记在衢州市江山市调研，在返程的车上，有一位工作人员聊到，附近有一个清漾村，存有一座毛氏宗祠。习书记听了，当即决定要到这个地方去看看。可是通往那个村还没有大路，车子不好开进去。习书记说，走路也要去看看。后来我们就在他的带领下，从附近的公路上下车，徒步走到清漾村进行调研。习

巍巍太行展红旗

——七亘大捷纪念碑碑文敬读

□ 李 萍

派100余名骑兵、300余名步兵掩护辎重部队再次向七亘村进犯。当日军骑兵、辎重部队进入我军伏击圈，我军发起攻击，日军万万没有想到会在同一个地方再次遭袭，顿时被打得人仰马翻，晕头转向，仓皇弃尸百余具，骡马数十匹，溃败逃窜。连续两次伏击，我军伤亡30余名，歼敌400多人。

七亘大捷是一二九师进入太行山的第一个大胜仗。由此点亮了太行之巅的抗日烽火，挺起了抗日救国的脊梁，并率先在太行山建立起抗日平东县政府。刘伯承运用“重叠待伏”战术取得胜利的光辉战例，是八路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丰碑，也是抗日战争初期，继平型关大捷后我军较大的一次胜仗，揭开了太行山抗日游击战的序幕。这一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体现了八路军不怕困难、敢于迎战强敌的决心和勇气，振奋了军心民心，打出了八路军军威，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一战役，给侵略者以重创，给民众抗日以信心，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热情。七亘大捷有力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支援了忻口会战正面战场，彰显了我党我军的抗战决心和意志。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不畏强敌，敢打硬仗，为抗战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